

新文化史经典译丛

理论经典

姜进 主编

新文化史

文化史的重点是仔细检视文本、
图画和行为
并对检视的结果持开放的态度
在文化模式下工作的历史学家
不应该因为理论的多样化而感到沮丧
我们正步入一个不寻常的新阶段



[美] 林·亨特 编
Lynn Hunt

姜进 译



上海市
著名商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新文化史经典译丛
理论经典

姜进 主编

新文化史

【美】林·亨特 编 姜进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化史/(美)林·亨特编;姜进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

(新文化史经典译丛)

ISBN 978-7-5617-8459-4

I. ①新… II. ①亨…②姜… III. ①文化史学—理论研究
IV. ①K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4998 号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edited by Lynn Hunt

Copyright © 1989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7-801 号

新文化史

编者 [美]林·亨特(Lynn Hunt)

译者 姜进

责任编辑 储德天

审读编辑 臧峪

责任校对 邱红棉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刷者 上海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32 开

印 张 7.75

字 数 213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459-4/K·343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总 序

还记得 1990 年代初,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正是后现代学术横扫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时,权力、建构、再现、认同、身份、性别、种族、酷儿(queer)等名词在前辈学者的著述和讲演中满天飞。研究生们很是兴奋,议论纷纷,都说这一轮后现代主义来势凶猛,但不知会不会也像此前一波又一波的学术新潮那样,转眼即逝。一位英国来的高才生此时淡淡地说了一句话:“风暴过后的的大海,难道还会是原来的大海吗?”他的意思很明白,可是这句话却有点儿费解。风暴过后的的大海,恢复了平静,不还是原来的大海吗?不过,仔细想想,也可能已经不是了。谁知道呢?因为费解,所以就留下了记忆。不管大海的比喻是否恰当,事到如今,我们看到的经过后现代风暴洗礼的西方学术界的大海已经是“换了人间”。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真理、规律、客观性、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分析范畴成为批评的对象被重新审视,权力和建构等新概念当仁不让地入主学术界,全面刷新了学术研究的理论前提、路径、方法、目标 and 作用,导致了汤玛斯·库恩意义上的科学范式的革命,西方学术界进入后现代时期。

后现代运动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初见端倪。法国思想家、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一系列著作开创了文化研究的模式。他的名作《诊所的诞生》(1963)、《疯癫与文明》(1965)、《规训与惩罚》(1975)、《性史》(1976)等,对 18 世纪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王国发起了颠覆性的批判,揭示了对理性的顶礼膜拜是如何导致了对个性和差异性的敌视,理性又是如何运用强大的技术手段去控制、压制并企图消灭差异和不同,从而建立起井然有序的现代社会秩序的。福柯的批判可谓石破天惊,打破了现代理性主义作为人性解放运动的神话,使人们看到了以理性之名对个性和人性自由发展的种种干预:从个

人的性取向到如何思想、如何做事、如何生活都必需依从理性的规训,因为理性本身代表着某种类似被其推翻的上帝的最高原则。福柯的著作描述了理性王国的建立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历史的终极。现代理性主义是一种话语,一种意识形态,并非如其宣称的绝对真理。理性是一个思想和言说的武器,是某些人手中的权力利器,另一些人的克星。福柯对现代理性运动的描述和反思使理性时代从绝对真理的神坛上走了下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后理性时代宣告来临,后现代也从此粉墨登场。西方社会中的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等边缘和弱势人群在学术界的代言人接过文化批判的武器,揭示了西方社会中的种种不平等及其理论根源,大众文化研究、同性恋及性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学术和族群理论成为弱势群体争取社会公民合法身份的武器,成为后现代学术的重镇。后现代理论又反过来为社会中形形色色的特殊人群对保持和追求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西方社会中的个人自由从而得到了极大的开发,后现代亦成为一个社会现象。

西方学术界的后现代之风中也有其来自东方之源。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东、西方早已纠缠在一起,互相影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后现代之风,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跨国界、跨文化的东、西方左翼学者共同推动形成的,而后殖民主义理论是其中最为强劲的一支力量。出身于巴勒斯坦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于1978年首创东方主义理论。萨义德在哥大的来自加尔各答的同事嘎娅特利·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于1988年首创了下属群体研究,并正式提出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印度学者吉安·普拉卡什(Gyan Prakash)等的大力倡导下,后殖民主义理论强势登场,成为后现代学术中的正义之师,从女性、下层民众、殖民地人民等边缘人群的角度,对西方中心的现代启蒙主义思想体系及其全球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揭示出在这一理性秩序之下所隐藏着的东、西方不对等的权力结构。

后现代学术在史学界是以新文化史的样式来表达自己的。早在1960年



代中到 1980 年代初,新文化史一批最早的经典就已陆续问世,包括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的《夜间的战斗:16、17 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1966,又名《丰收巫师》)和《奶酪与虫:一个 17 世纪磨坊主的世界》(1976 年)、埃曼纽·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1294 - 1324 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1975 年)和娜塔莉·戴维斯(Natalia Davis)的《马丁·盖尔归来》(1983 年)等。这批著作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极大影响,在试图摆脱传统史学的精英主义的同时也扬弃了当时盛行的社会史、经济史的计量方法,而比福柯的历史更远离精英世界及其普世原则。这些著作所注重的是生活于此时此地特殊环境之中的人群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将研究聚焦于下层百姓的日常生活及其意义世界,用叙事史学的方式细细描述,将读者带入了一个个不同的微观世界,使历史这一古老的学科变得愈发迷人、有趣、生动,昭示了历史原来是可以如此书写的。1980 至 1990 年代是新文化史迅速扩张发展的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新的经典,一方面用文化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刷新了传统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等领域,同时更开拓出史学研究的诸多新领域,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史运动。除了上述微观史的一些代表著作外,著名的政治文化史著作有汤普森(E. P. 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1963)、林·亨特(Lynn Hunt)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1984)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家庭罗曼史》(1993)、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制作路易十四》(1992)、以及丹尼尔·罗什(Daniel Roche)的《启蒙运动中的法国》(1993);社会文化史方面有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与社会》(1972)、杰克·古迪(Jack Goody)的《欧洲家庭 and 婚姻的演变》(1983)、以及娜塔莉·戴维斯的《边缘上的女人:17 世纪的三个故事》(1995);物质文化史方面的领军人物是杰克·古迪,著有《烹饪、菜肴和阶级:比较社会学研究》(1982)和《花的文化》(1993),以及丹尼尔·罗什,著有《服装的文化:“古王朝”的装束与时尚》(1989)和《日常物品的历史:消费文化在法国的诞生 1600 - 1800》(1997);感性文化史方面有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1968)、阿兰·柯

尔本(Alain Corbin)的《傻子与香味:嗅觉与法国社会想象》(1982)和《时间、欲望和恐怖》(1991);身体性态史方面有林·亨特主编的《艳欲与身体政治》(1991)和《色情的发明:淫秽与现代性的起源 1500 - 1800》(1993)、朱蒂斯·克维奇(Judith Walkowitz)的《恐怖乐趣的城市:维多利亚晚期伦敦的性危险的叙事》(1992);罗伯特·达恩顿是媒体与传播史中研究印刷和阅读文化的领军人物,著有《启蒙运动的生意》(1979)、《大革命前法国被禁的畅销书》(1995)、与丹尼尔·罗什合作著有《印刷中的革命:法国的出版业 1775 - 1800》(1989)、与彼德·伯克合作著有《媒体的社会史:从古腾堡到互联网》(2001)等。这批著作深受福柯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以及文化研究、符号学的影响,以文化体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模式,代之以存在与意识互动、更强调文化对社会关系的形塑作用,颠覆了盛行一时的社会史模式。在此背景下,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于1989年问世,明确打出了新文化史的大旗,确定了历史学主流之“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的事实。

我在斯坦福大学求学之时,正是新文化史风起云涌之际。当年阅读上述那些史学新作时所感受到的巨大的精神和智力上的冲击和挑战,与同学老师讨论时的兴奋和激动,记忆犹新。如今,新文化史已经成为西方史学的主流,不再新鲜,甚至已经成为反思的对象。林·亨特本人和她的同事们就在打出大旗的十年后,出版了《超越文化转向》(1999)一书,对文化转向后的史学理论和多元化史学实践中的问题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作了一次审视和检讨。史学界对文化转向的怀疑之声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不过,无论是来自新文化史内部的反省,还是来自史学界其他部分的质疑,似乎都在不断地被新文化史所消化和吸收,使文化转向的基本理论主张和研究方法更富有涵盖性和普遍性,不仅吞并了传统思想文化史领域,更渗透到传统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领域里,使基于文化转向的史学模式进一步扩大其应用范围,当仁不让地稳坐史学主流的第一把交椅。

史学的文化转向并非是对此前社会史主流的简单修正,也并不仅仅是研



究重点的转移,而是后现代理论对从 19 世纪的兰克学派到二战后兴起的社会史将历史学科学化的现代主义史学潮流的一次清算。新文化史的叙事史也不是对古典叙事史学传统的简单回归,而是有着一组十分不同的理论假设和叙事策略的史学新范式。这一新范式的特点是对前科学时代叙事史的重新发现,对史学的文学性的重新肯定,其最感兴趣的是语言建构和改变社会政治生活的机制和过程。如果说现代主义史学是以寻找和掌握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以此种“客观真理”来解释和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那么新文化史则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多元的、充满偶然性的开放体系,而史学的功用就是去探寻和解读社会所赖以运行的语言和技术系统,如此而产生的史学知识本身就会形成对社会政治的干预,成为改造社会政治的一种力量。我们可以通过其中一些关键概念对史学的文化转向作一个粗陋的描述。

文化转向有时也称语言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其知识论的来源是语言学中的符号学。在后现代的批判中,语言符号与其所指之事物之间并不一定是一一对应的,符号在使用过程中会脱离原来所指之事物而成为某种意义的象征。语言所构成的意义世界绝非其所处客观世界的镜像,反而是形塑人们感知客观世界的滤镜。简而言之,存在并不一定决定意识,而意识反过来却一定有塑造存在的功效。这就打破了形形色色的决定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或年鉴学派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只有人类才拥有的语言及其抽象能力被看作塑造人类生存状态的特殊重要的力量,从而成为史学研究的出发点。史学研究也从调查人类社会的客观状态转而探寻文化体系是如何塑造和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也就是说语言是如何通过知识的生产去形塑和改变社会、政治、经济的权力结构的。既然存在和意识之间没有固定的对应关系,简单的因果关系、线性的历史发展观,以及作为社会科学的史学对统一性、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强调在新文化史中被宣告出局。地点、时间以及人群组合的特殊性、差异性、偶然性、多元性成了常态,对各种文化体系的解读(reading)也就代替了对前因后果的解释(explaining)。新文化史注重于细致描述具体人群的具体生活,并不刻意把自己的描述对象当作某种统一性的典

型代表,反而对其特殊性更觉兴味盎然。达恩顿说得好:“很多貌似过时的史学争论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力求接触人类最大多数的努力。想想有多少人已经消失在过去,他们在人数上远比如今生存于地球上的后代为多。最令人激动、最有创意的历史研究应该挖掘出事件背后我们的前人所经历和体验的人类生存状况。这类研究有过不同的名字:心态史、社会思想史、历史人类学,或文化史(这是我的偏好)。不管什么标签儿,目的是一个,即理解生活的意义:不是去徒劳地寻找对这一伟大的哲学之谜的终极答案,而是从前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去探求和了解前人对此问题的回答。”^①

无论是貌似平静的日常生活,还是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新文化史研究的焦点都是当时当地参与其中的人群对自己的生活和周围世界的体验和理解决,她/他们的生存策略以及表达自己诉求的特殊方式,相信生活在过去的男男女女正是以自己特殊的生存策略和对自由解放的向往开辟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无限可能性。相对于将重大历史事件放在某一目的论体系中去寻求因果解释的现代史学来说,新文化史感兴趣的是事件的具体过程,要根据事件过程中发生的新的话语和社会实践来认识其特殊意义。以法国大革命史为例,现代史学所关注的是大革命的原因及其后果,由此而形成的大革命的前因后果又会向前后两个方向延伸,形成一条线形的因果链。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将大革命解释成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演进中的一环,还是现代主义学派将大革命看作从中世纪政治走向现代国家的转折点,其关注的重点都越来越远离大革命本身而转到大革命之前和之后的比较。在新文化史看来,这种目的论史学为了解释大革命的因果关系而牺牲了对大革命过程的具体考察,忽视和过滤掉了许多不能被特定因果链所容纳的重要现象。林·亨特在《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一书中对大革命过程中的政治表达模式进行了仔细的考察和分析后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特殊成就在于构建了一种

① Robert Darnton, *The Kiss of Lamouretts: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0, p. 4. 转引自本丛书萧知纬译,罗伯特·达恩顿著:《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第6—7页。



全新的政治文化，发明了意识形态。她在导言中指出：“法国大革命让时人感到震惊，并不是因为它为资本主义发展或政治现代化打下了什么基础。英国人找到了更多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有效途径，普鲁士人则证实了一个国家可以没有民主，没有革命，但同样可以实现政治现代化。法国大革命对经济增长或政治稳定几乎没什么贡献。然而，它确实开发了民主共和主义在民众动员方面的潜力，并营造了革命变迁中催人奋进的紧张气氛。民族复兴的语言、平等博爱的姿态、共和主义的仪式都不会被很快遗忘。民主、恐怖、雅各宾主义和警察国家在政治生活中也一再出现。”^①

如果说新文化史有什么一以贯之的目标的话，那也许就是通过对各种文化体系的调查去研究话语、仪式、再现(representation)中权力运作的机制、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以及所达到的成效，从而揭示权力是如何通过控制知识的生产来展开博弈的。有意思的是，这些权力运作的策略是中性的，压迫者以此来达到控制、统治和压制他人的目的，被压迫的人们也会以此来进行反击，压迫与反压迫之间的斗争就围绕着知识的生产和运用而不断地进行。对于新文化史来说，一切经济、社会、文化都是政治的，充满了权力的博弈的。新文化史就是要在世人面前展示权力运作的真相，同时指出人们又是如何反抗压迫的；其对权力运作机制的深刻解析和批判，及其反对压迫和控制的政治、道德倾向贯穿始终，可以说是新文化史的灵魂。更重要的是，后现代对于压迫和控制的批判、新文化史对个体性、具体性、特殊性的强调都是建立在个人权利(human rights)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具有普适性的价值预设之上的，其反对的不仅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或者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压迫，而是一切形式的对任何个体天赋人权的剥夺和压制。在这方面，新文化史秉承了马克思以人性解放为标的政治理想。

新文化史的理论和实践给古老的历史学科带来了新气象。后现代对现

^①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 15. 转引自本丛书汪珍珠译，林·亨特著：《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第27—28页。



代主义建立在目的论基础上的宏大叙事的批评加速了百科全书/通史类史学模式的式微,为以问题为中心的批判史学开辟了道路。以问题为中心的史学必然是自主的、多元的、大众的。因为每一位史学家都会有自己的身份认同,都会对某些个人和社会群体所遭到的压迫持批判态度,从而产生自己迫切想要调查研究的问题,并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来干预和改造现状。以问题为中心的史学又必然是跨学科的,因为史学家需要动用所有可资利用的资源和方法对自己的课题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做出令人信服的解读。新文化史文化批判的理论和方法渗透到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在此影响下,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使这些领域的传统研究对象都和文化政治搅和在了一起。政治史不再只是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变成了政治文化的演变史;传统经济学因为文化因素的介入而演变成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史也不再满足于描述下层人民生活的客观状况,而是要了解文化体系是如何塑造了民众的身份认同、情感和日常生活的。传统思想文化史更是被新文化史彻底颠覆。在这里,主要的任务不再是如何正确理解大师们的思想,而是要探究思想、仪式、知识、风格作为话语是如何产生的,某些话语是如何取得霸权地位的,其作用于社会的功效如何,等等。史学研究的领域从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对日常生活和重大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覆盖。史料的范围也空前扩展,从仪式、个人的口述史、小报、民间传说、戏剧、小说、绘画、流行歌曲到服饰,都可以成为史料。就研究专题来说,也是应有尽有,从福柯对疯癫、性文化、监狱、诊所等的研究,到达恩顿的《屠猫记》、凯斯·汤玛斯(Keith Thomas)的《宗教与巫术的兴衰:16-17世纪英格兰的大众信仰研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王氏之死》,都为读者栩栩如生地描绘了日常生活场景中一个个全景式的片断,使读者在了解过去民众的生活的同时能够反观自己的世界,而不只是充当帝王将相历史的无关紧要的旁观者。

汉文世界介绍新文化史的工作近年来做了不少。其中台湾对新文化史的推介工作要比大陆的更为积极,出版的译著也较大陆为多。大陆学者也间或有翻译出版福柯及有关新文化史经典专著的。而留学欧美的汉文学者是

译介新文化史及其他有关西方经典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新旧世纪交替的这十数年中,陆陆续续出版的有关译著不下几十种,但大多是各自为战,零零散散,未能形成体系。其中不乏精品译作,但滥竿充数的也不在少数。这些译著对汉文人文社科学术界的影响各有优劣,好的译著影响深远,劣质的译著往往令读者茫然不知所云,更要受误译误导之苦。有鉴于此,我们希望能够出版一套丛书,在已有译著的基础上,再系统地翻译出版海外新文化史的一系列经典著作,向汉文世界集中而较为全面地介绍这一重要的学术运动。在我们精选的著作中,有林·亨特主编、影响巨大的论文集《新文化史》和罗伯特·达恩顿讨论方法论的《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这样的理论经典,提纲挈领地给出了新文化史的开端、发展,及其基本理论假设、方法论、研究策略以及其所关心的一些课题的概况。也有如林·亨特的《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及罗伯特·达恩顿的《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和《大革命前法国被禁的畅销书》等重写法国大革命史的经典之作。海外新文化史的成果丰富,覆盖面极广,而且多为跨学科的研究,很难有明确的分类。为了读者的方便,这套丛书仍将所选经典大致分出一些专题,陆续翻译出版。这些专题包括理论经典、微观史、政治文化史、社会文化史、感性文化史、身体性态史、物质文化史、媒体与传播史等。

近年来,多次给历史系和中文、社会学等有关学科的研究生开设新文化史的阅读课,深感年轻学子对了解海外新学术之渴望,亦深感高质量译著之至关重要,却往往叹其可遇而不可求。翻译学术著作,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的译者均任教于海内外不同高校,都是凭着对学术的热爱和为学界服务之心,自告奋勇,接下艰苦的翻译任务,辛勤耕耘,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为读者奉献一批合格的、出色的译著,为新文化史这一重要的学术运动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推介工作。

在此丛书即将面世之际,我们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要感谢本丛书的策划储德天编辑,她对学术的热爱、她的学术眼光和她作为编辑的专业精神,使这套丛书得以顺利出版。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学生



们,是她/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和课堂上的热烈讨论,使我相信这是件值得做的事情,才下决心和储编一起来做这套丛书。谨以此丛书献给我们的学生——中国学术的未来。

姜进

2010年3月8日

写于海上凤凰城

致 谢

本书的最初构想形成于“法国史：文本与文化”会议上。会议于1987年4月11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召开，以配合夏尔提埃(Roger Chartier)在那年春季到伯克利校区所作的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虽然这一项目的涵盖面逐渐扩大，吸收了关于其他国别史的论文，本书的所有作者都曾参加了会议，而这一集体性经历对于寻找关于文化史的共同兴趣和理解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会议由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法国研究项目组织召开，由佛罗伦斯·J. 歌而德(Florence J. Gould)基金会和乔治·勒西(Georges Lurcy)慈善与教育信托基金会资助。我们非常感激这两个基金会和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他们的帮助使得此次思想的聚会成为可能；我们也要感谢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她承担了总评论员的工作；还要感谢与会的许多法国史及其他历史领域的学者们。

目 录

致谢 / 1

导论:历史、文化与文本 林·亨特 / 1

第一部分 文化史诸模式 / 23

第一章 米歇尔·福柯的文化史 帕翠西娅·欧布莱恩 / 25

第二章 E·P·汤普森和娜塔莉·戴维斯著作中的群众、共同体和仪式
苏珊娜·德山 / 46

第三章 地方性知识、地方性历史:吉尔兹及其他 阿勒塔·比尔萨克 / 69

第四章 文学、批评及历史想象:海登·怀特和多米尼克·拉卡普拉的文
学挑战 罗伊德·克雷梅 / 95

第二部分 新研究路径 / 123

第五章 美利坚游行:19世纪社会秩序的再现 玛丽·莱恩 / 125

第六章 文本、印刷、阅读 罗杰·夏尔提埃 / 146

第七章 身体、细节和人道主义叙事 托马斯·拉科尔 / 165

第八章 在文艺复兴君侯的房间里看文化 兰道夫·斯达恩 / 193

译名对照表 / 222

译者后记 / 229

导论：历史、文化与文本

林·亨特

1961年，卡尔(E. H. Carr)宣布：“历史学越具有社会性，社会学越具有历史性，就越有利于这两门学科的发展。”^①这是卡尔主要针对他的历史学同行，尤其是那些英国的史学家们所下的战书。不管他们多么不情愿，卡尔还是希望将他们拖入以社会学为导向的史学新时期。现在看来，卡尔似乎是对的：这两个领域的前沿都是社会—历史的。历史社会学已成为社会学最重要、可能也是成长最快的次领域之一；与此同时，社会史已经超越政治史成为历史学中最重要研究领域(在美国，1978年社会史方面的博士论文数量是1958年的4倍，超过了政治史)。^②

历史学中，社会史的转向受到两种支配性解释范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虽然马克思主义在1950和1960年代算不上新鲜，学派内部却新潮涌动，激发着史学家对社会史的兴趣。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始以“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为号召发表论著，其中有些如今已成为经典，如乔治·路德(George Rudé)关于巴黎的群众、阿尔伯特·索布尔(Albert Soboul)关于巴黎的无套裤汉、汤普森(E. P. Thompson)关于英国工人阶

① Edward Hallett Carr, *What Is History?* (New York, 1965; first published 1961), p. 84. 译注：汉译本有王任光译《历史论集》(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68年)。

② Robert Darnto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The Past Before Us: Contemporary History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ed. Michael Kammen (Ithaca, N. Y., 1980), p. 334.

级等的研究。^① 受此启发,1960 和 1970 年代的史学家们从研究政治领袖和政治制度的传统史学转而调查工人、仆佣、女性、族群等等社会群体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

同时成为显学的还有年鉴学派,虽然其影响要稍晚一些。这一学派最早的纲领性刊物《经济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于 1929 年由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和吕西安·菲布尔(Lucien Febvre)创办,1930 年代从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迁到巴黎,并于 1946 年改为现名《年鉴:经济、社会、文明》(*Annales: E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年鉴学派的称谓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年鉴》成为了高等实践研究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第六部的学报。福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 1950 和 1960 年代主持第六部的工作,又主管《年鉴》,使年鉴学派获得了某种统一性和延续性。^②到 1970 年代,年鉴学派已经蜚声国际;1979 年出版的《国际历史研究手册》(*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中除了有关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条目之外,有关年鉴学派的条目比其他任何主题都要多。^③

但是,是否真的存在特莱恩·斯托恩诺维奇(Traian Stoianovich)在他以此命名的书中所坚称的年鉴“范式”呢?他宣称年鉴学派强调以连续性、功能性和结构性研究进路去理解作为整体有机体的社会。“年鉴范式就是要探究

① George Rudé,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59); Albert Soboul, *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II*, 2d ed. (Paris, 1962);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1963). 译注:汉译本有贾士衡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 年)。

② 关于年鉴学派的历史,可参见 Stoianovich, *French Historical Method: The Annales Paradigm* (Ithaca, N. Y., 1976);和 Guy Bourdè and Hervé Martin, *Les Ecoles historiques* (Paris, 1983). 译注:另可参考彼得·伯克(Peter Burke)著,江政宽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 1929—1989》(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 年)。转引自林·亨特编,江政宽译《新文化史》(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 年),注释 4,第 23 页。

③ Georg G. Iggers and Harold T. Parker,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storical Studies* (Westport, Conn., 1979). 译注:汉译本有陈海宏等译《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 年)。